

## 試論毛澤東與大躍進時期高指標提出的關係

◎ 周 震

大躍進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方面的重大嘗試。歷史已經證明，中共的這一探索是不成功的。大躍進時期，一些地區、行業和部門紛紛提出高指標，諸如「苦戰三年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消滅病蟲害」<sup>1</sup>「湖南爭取明年為無蟲害省」<sup>2</sup>等等，中共試圖通過高指標提高群眾熱情，達到發動群眾運動的目的。但是，經濟有其運行規律，它並不會隨群眾運動的興起而得到超常規的「躍進」。所以，雖有高指標、雖有群眾高度的熱情，但是我們得到的經濟成果確是很少。高指標的提出是一個歷史過程，經歷了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大躍進這四個階段。毛澤東應對大躍進時期的高指標負有直接責任，這一點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承認了的。本文認為毛澤東與大躍進時期高指標的關係表現在：毛澤東肯定或直接提出了一些高指標；毛澤東不斷的批評右傾保守思想，使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迫於政治壓力接受毛澤東的觀點，提出本部門或本地區的高指標；毛澤東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工作方法，造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壓力，使得各地區與部門也相繼提出一些高指標。

### 一 毛澤東直接提出或肯定了一些高指標

這裏所說的毛澤東直接提出的一些高指標，主要是指趕英超美的目標和以糧、棉、鋼、鐵為主的經濟上的高指標。毛澤東作為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想讓國民經濟發展得更快一點、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的更高一點，這沒有錯，也無可厚非，其實這也是當時全國人民的想法。自鴉片戰爭失利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曾經受到大大小小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落後。廣大人民因此在新中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初創之後，就有一種趕超發達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強國的願望。同時，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更加劇了這種情緒。

受這種情緒感染，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在15年之後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他說：「赫魯雪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sup>3</sup>這裏毛澤東說的趕超英國，主要是指在鋼鐵產量方面。12月2日，劉少奇在全國工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向全國人民傳達了這一指示時，他說：「在15年內，蘇聯的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和產量方面，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sup>4</sup>李富春在隨後的《關於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和今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方針的報告》中論證了這種可能。依客觀情況而論，中國經濟若沒有遭受到大躍進、「文革」等一系列「左」傾錯誤的破壞，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在鋼鐵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大躍進中，趕英的目標不斷的發生改變，表現在：趕超時間上一再縮短，趕超對象由英國變為了英、美。1958年4月2日，毛澤東在接見波蘭代表團時說：「我們中國趕上英國，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sup>5</sup>「再有二十年就趕上美國。」<sup>5</sup>距離1957年莫斯科會議還不到半年，毛澤東就把十五年趕上英國的目標修正為十年或者十一年，並把二十年趕上美國的目標也提了出來，這是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思想的具體體現。4月27日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十五年趕美看來不是沒有可能。」<sup>6</sup>這個目標又比月初他所提的目標提前了5年。

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期間，王鶴壽同志在發言中認為「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sup>7</sup>1958年6月1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報送的「二五」計劃要點中同樣提到「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此檔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6月17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談到：「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sup>8</sup>離1957年11月只有7個多月時間，毛澤東把趕英的目標從15年提前到2年了。這反映出毛澤東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持非常樂觀的態度。加之大躍進時期，一些地區、部門捷報頻傳，更加堅定了毛澤東「趕英超美」的信心。可以說，「趕英超美」目標一再提前，打亂了中國正常的計劃工作，給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毛澤東除了提出趕英超美的目標外，還提出或者肯定別人提出的一些高指標。為了配合「趕英超美」的目標，毛澤東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中國鋼鐵產量翻番的目標，此後中國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的高潮，造成整個國家鋼鐵產業畸形發展。大煉鋼鐵運動高潮之時，甚至連商店都搬到工地上晝夜為煉鋼鐵的工人們服務。另外，毛澤東對別人提出的高指標，有些也很贊成。例如毛澤東對上文講到的李富春關於「二五計劃要點」的報告，他就很滿意，批示到：「很好一個檔，值得認真一讀，可以大開眼界。」<sup>9</sup>

## 二 毛澤東不斷批評右傾保守思想對提出高指標的影響

從1955年第4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建設中出現了一股冒進的勢頭。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社會主義的改造進入了高潮，給各部門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另一個方面是毛澤東對右傾保守思想不斷的批判，使各部門的壓力驟升。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澤東對鄧子恢的批評：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sup>10</sup>。此後，毛澤東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進一步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

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sup>11</sup>

這一序言的發表，對各部門的震動相當大。於是，各部門紛紛調高指標。國家計委將1967年的糧、棉、鋼、煤的計劃指標分別修改為：糧食由1955年的6000億斤提高到9500億斤（加上大豆，實為1萬億斤）；棉花由1955年的5600萬擔提高到1億擔；鋼由1955年的1800萬噸提高到2500萬噸；煤由1955年的2.8億噸增加到3.0億噸。許多部門則把原來1967年實現的指標提早5年，改為1962年實現<sup>12</sup>。

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民經濟計劃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計劃若冒進，帶來的勢必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混亂。在事實面前，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開始冷靜下來，逐步調低過高的指標，最終使八大一次會議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這些措施的施行，使1957年的國民經濟發展水準成為改革開放前少有的幾個好的年份之一。對於「反冒進」，毛澤東是不滿意的，但是他還是尊重了黨的集體領導。

從八屆三中全會開始，毛澤東把精力再次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逐步將他對反冒進的不滿表露出來。在八屆三中全會的閉幕式上，毛澤東批評了反冒進：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sup>13</sup>。毛澤東說要恢復這些東西，並說反冒進是右傾，是促退。這樣的講話使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感受到了壓力。

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審閱的〈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該文對反冒進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首次使用了「躍進」一詞，獲得毛澤東的好評。12月12日，《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經毛澤東修改並經政治局會議通過的〈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繼續對反冒進提出批評。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繼續對反冒進提出嚴厲的批評。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道：「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sup>14</sup>

南寧會議以後，全國上下，「熱氣騰騰」，掀起了一個生產的高潮，一些地方上的領導人開始提出一些高指標，並且越來越高。毛澤東這時候頭腦也不冷靜了，他在成都會議上做了六次講話，講話繼續批評了反冒進，他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sup>15</sup>」這樣的提法就比較嚴重了，把冒進與反冒進的對立提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高度，這不能不給反冒進的領導人以相當大的壓力。

在毛澤東的講話鼓舞下，會議通過的國家計委《關於一九五八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賬的意見》中，一些主要的經濟指標比這年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數目提高了很多，如：鋼產指標從六百二十四萬八千噸提高到七百萬噸，糧食指標從三千九百二十億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億斤<sup>16</sup>。一些省的負責人也相繼提出一些高指標。南寧會議與成都會議實際上為八大二次會議全面發動大躍進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毛澤東主要通過這兩次會議，扭轉了反冒進以來的形勢，並使得劉少奇等人不斷的檢討。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兩次會議，社會上形成了一股躍進之風。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把大躍進運動推向高潮。劉少奇作了大會工作報告，報告內容體現的基本是毛澤東的思想。劉少奇指出，中國已經進入馬克思預言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代，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當時歷史階段的高指標。即使在現在，這些高指標都不一定能夠完全實現，如：技術革命方面，「把包括農業和手工業在內的全國經濟有計劃有步驟地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使一切

能夠使用機器的勞動都使用機器，實現全國城市和農村的電氣化；使全國的大中城市都成為工業城市，並在那些條件具備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業基地，使全國的縣城和很多鄉鎮都有自己的工業，使全國各省、自治區以至大多數專區和縣的工業產值都超過農業產值；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一個以現代工具為主的四通八達的運輸網和郵電網。」<sup>17</sup>文化革命方面，「掃除文言，普及小學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鄉都有中等學校，一般的專區和許多的縣都有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完成少數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積極地進行漢字的改革；消滅『四害』，講究衛生，提倡體育，消滅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風易俗，振奮民族精神。<sup>18</sup>」

八大二次會議之後，全國掀起了大躍進的狂潮，高指標紛紛出籠。5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建議將1958年鋼產量指標提高到800-850萬噸，將1962年的指標提高到4000萬噸。冶金部黨組提出，1959年全國鋼產量可以超過3000萬噸，1962年可以超過8000-9000萬噸。北戴河會議更是把大躍進推向了頂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指出：「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糧食產量達到8000億斤到10000億斤，鋼產量達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sup>19</sup>1958年11月，鄭州會議通過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初稿）》提到：到1972年，全國平均糧食畝產要達到5000斤至10000斤並且全國耕地實行「三三制」，即把全國土地平均分成3份，三分之一用於種植農作物，三分之一用於休閒和種植綠肥，還有三分之一用於種樹和種草<sup>20</sup>。

這些聽起來振奮人心的高指標，嚴重的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破壞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使得重工業尤其是鋼鐵工業異軍突起，擠佔了其他產業發展的空間，損害了其他產業的利益，進而影響到中國工業整體的發展水準。在無情的現實面前，毛澤東逐漸察覺到大躍進運動的偏差，開始與黨內其他領導人一道糾「左」。但是，1959年廬山會議發生彭德懷的問題後，糾「左」變成了反「右」，並把階級鬥爭的觀念引入了黨內。此後各地的高指標與浮誇風又開始盛行起來。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或黨的每一次反右傾保守思想過後，就有一次經濟指標的向上調整，經過幾次反右傾保守思想之後，指標被抬得越來越高，於是一些地方就開始造假，浮誇風遍及全國，在國內外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 三 毛澤東提出的一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提出高指標的影響

毛澤東一貫重視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問題。大躍進運動前後，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於思想與工作方法的講話，其中很多內容是正確的，是在社會主義探索中取得的經驗總結。但是由於受到當時「左」的情緒的影響，毛澤東很多講話的內容沒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毛澤東講話中一些錯誤的東西在實際工作或在理論宣傳中被貫徹了，起到了不好的影響。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講了許多關於思想方法與工作的方法問題。關於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的問題，毛澤東說：「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sup>21</sup>這段話現在看來也是正確的，創新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動力。但是這段話在大躍進時期，就起了不良作用，在「獨創精神」的鼓舞下很多合理的規章制度被廢除了，給生產與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損失。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還談了「解放思想，反對迷信」的問題。毛澤東說：「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



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子鎮壓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問題。」<sup>22</sup>他還講了一些不要怕教授之類的話，並舉了馬克思、康有為、章太炎等人年輕時候就有相當大的成就的典故，以此來鼓舞大家的幹勁，並得出了「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的結論。本來毛澤東講話的原意可能是讓人們要自信，不要迷信所謂的「權威」，出發點很好，但是在當時「左」的思想已經抬頭，人們把很多不是迷信的東西當作迷信破除了。

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四次講話，主要講的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說：我們的同志有幾怕。第一種怕教授，第二種怕馬克思。以為馬克思住在很高的樓上，要搭很多長的梯子才能爬上樓去。我看，樓下的不要怕樓上的人。列寧說的、做的，許多東西都超過了馬克思。我們做的也有許多超過了馬克思。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sup>23</sup>。他把自己的講話總結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sup>24</sup>。毛澤東在5月20日的講話中，再一次講到了「破除迷信」的問題。他把外行領導內行看成了普遍規律。毛澤東還講到「拔白旗，插紅旗」的問題，他說：凡是有人的地方總要插旗子，不是紅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無產階級的紅旗，就是資產階級的白旗<sup>25</sup>。毛澤東的這些講話一傳達，助長了基層「左」的思想與做法，許多科學的東西當作迷信反掉，這是「浮誇風」、「瞎指揮風」產生與氾濫的重要原因。「拔白旗、插紅旗」的講話，加劇了整風運動中的某些「左」的做法，傷害了一批知識份子。

應當承認，毛澤東關於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講話，對於高指標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例如，在八大二次會議期間，一些代表在大會熱情的鼓舞下就提出了一些高指標。湖南組認為：中國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是完全可能的。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趕，而在於敢不敢趕<sup>26</sup>。廣東組認為：6億人民都真正解放思想了，群眾的無窮無盡的智慧將匯成巨大的物質力量，將大大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sup>27</sup>。化學工業部負責人在發言中說：仍然處於嚴重落後狀態的化學工業在10年內是可能趕上和超過美國的，是能夠和美國較量的<sup>28</sup>。江蘇負責人說：在農業方面，1958年要在1957年的基礎上，糧食增加20%至25%，棉花增加20至25%，油料增加50%至60%，牲畜增加80%至100%，蠶繭增加20%至25%。到1962年或者多一點時間，江蘇省則完全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規定的各項指標<sup>29</sup>。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鼓動下，高指標在全國開始蔓延。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1962年）的各項主要指標是：鋼8000—10000萬噸，比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1957年）的產量增長13.9—17.7倍；鐵9000—11000萬噸，增長14.4—18倍；煤9—11億噸，增長5.9—7.4倍；糧食13000—15000億斤，增長2.5—3.1倍；棉花1.5億擔，增長3.6倍；工業總產值5700—6500億元，增長7.4—8.5倍；農業總產值2300—2500億元，增長2.5—2.8倍；基本建設總投資3850—4300億元，增長6.8—7.7倍<sup>30</sup>。很顯然，這樣的高指標如果貫徹到經濟生活中，必定打亂中國經濟發展的正常步驟，造成對國民經濟的破壞。另外，農業部9月初在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出：明年要做到基本上取消用手插秧，做到水稻插秧半機械化<sup>31</sup>。這樣的高指標，在現在中國有些地區還不一定實現，但是在當時「破除迷信」的壓力下，被看成理所當然能夠實現的目標。「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際上對大躍進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高指標的出籠，一方面反映的是黨和群眾迫切改變中國貧困落後的願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種全民急躁的情緒，黨的一些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有這樣的情緒。毛澤東對大躍進的發動

負有直接責任，因為他是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很多高指標由他本人提出。作為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實事求是代表的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卻表現得不那麼實事求是了，有時候甚至有強烈的主觀主義思想。現在看來，大躍進時期很多高指標如1958年產鋼1070萬噸由毛澤東提出，但是一些部門、行業和地區出於當時的政治壓力或其他原因，在毛澤東提出的高指標上再層層加碼，並吹噓一定能夠完成，這樣給了毛澤東一種錯覺，使他覺得他定的指標是符合實際的，是能夠完成的，於是，在一些情況下，毛澤東又提出一些高指標，各部門、各行業、各地區在大躍進狂潮下，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計劃，提出更高的指標，不斷打破經濟的綜合平衡規律。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指標越來越高，也就越來越不符合實際。一些部門、行業和地區，為了完成實際上不能完成的高指標，開始浮誇、造假，更有甚者對敢於說實話的群眾打擊報復，這是中國陷入1959-1961三年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對困難，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首要工作就是調低高指標，尊重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規律。經過艱難調整，國民經濟在「文革」前，逐步恢復到大躍進前的水準。

可以說，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嚴重過失。因此，毛澤東對大躍進時期高指標的提出應當負有直接責任。但是，不能把全部責任與錯誤都讓毛澤東一個人來承擔。其實，在大躍進過程中，他對一些地方領導人提出的一些過高的指標表示過懷疑，並提議要「壓縮空氣」，這在當時大家都頭腦發熱的時候是難能可貴的。對於這一問題，還是鄧小平講的好：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sup>32</sup>。

鄧小平的談話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那時中國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加之毛澤東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很多決策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志，因此他在一些問題上應該負有責任，具體到高指標來說，毛澤東應該負有直接的責任，但不是全部的責任，畢竟我黨是集體領導，況且也是在探索中發生的失誤，以後糾正大躍進一些「左」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也很堅決，所以我們不應過多的糾纏於責任歸屬方面的問題，而主要應當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為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貢獻力量。

## 註釋

1、2、4、31 《人民日報》，1958年8月3日；1958年11月21日；1957年12月3日；1958年10月8日。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691；頁695。

5、6、8、9、13、14、15、16、21、22、23、24、25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812；頁813；頁824；頁823；頁720；頁769；頁790；頁803；頁790；頁797；頁816；頁817；頁818。

10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載《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418

11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35-436

12、20、26、27、28、29 謝遠學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紀實》，第7部，上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3），頁430；頁600；頁538；頁539；頁546；頁547。

17、18 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128.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128.htm)

19、30] 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76；頁77

32 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96

周 震 湖南省湘潭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毛澤東思想、中共社會主義時期歷史。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一期 2008年2月29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一期（2008年2月29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